

ИНСТИТУТ МАРКСИЗМА-ЛЕНИНИЗМА при ЦК КПСС

К. МАРКС
и
Ф. ЭНГЕЛЬС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14

Издание втор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 1959

根据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1959 年版译出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十四卷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门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字第 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900×1220 毫米 $\frac{1}{32}$ · 印张 32· $\frac{1}{8}$ · 插页 10 · 字数 788,000

1964 年 8 月第 1 版

1964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01 · 578 定价(四)4.10 元

第十四卷說明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四卷收集了他們給資產階級的进步出版物“美國新百科全書”寫的一系列條目和馬克思的論戰性巨著“福格特先生”。從寫作時間（1857年7月—1860年11月）來看，這些著作同編入本版第十二卷，第十三卷的著作和第十五卷的部分著作是相銜接的。

收入本卷的著作同這個時期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其他著作一樣，是無產階級運動和民主運動開始活躍時期的著作。資本主義經濟史上第一次世界經濟危機（1857—1858年）為已開始的無產階級的革命階級鬥爭的新高潮、為一系列國家的反封建的人民運動和被壓迫民族的民族解放鬥爭的加強準備了基礎。消滅封建主義的殘余、消滅民族壓迫、統一政治上被分裂的國家——德意志和意大利，這些任務又特別尖銳地提出來了。由於資產階級日益走向反革命，歐洲無產階級就成了革命地解決這些任務的主要戰士。對於歐洲無產階級來說，完成由於1848—1849年革命的失敗而沒有實現的資產階級性的改造是走向無產階級革命的必要步驟。

革命事變的臨近，孕育著大規模的軍事衝突（如1859年法國和皮蒙特對奧地利的戰爭所表明的）的複雜的國際形勢，促使工人階級的領袖馬克思和恩格斯加強了在準備國際無產階級進行新的階級鬥爭方面的活動。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和恩格斯對革命理

論的制定，他們為建立無產階級政黨而進行的鬥爭，他們對無產階級在各個不同國家的國內和國際形勢的根本問題上的策略的論證，對國際衝突和戰爭的起因和階級性質的闡述，對武裝鬥爭的規律性的揭示，以及他們對工人階級的思想敵人的猛烈駁斥，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第十四卷發表的著作反映了這個時期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理論活動和革命實踐活動的許多方面。抨擊性著作“福格特先生”是馬克思捍衛形成中的無產階級政黨，反對資產階級營壘中的誹謗者和誣蔑者的卓越言論。馬克思和恩格斯給“美國新百科全書”撰稿（這在當時對馬克思來說是維持生活的一個來源，而對恩格斯來說則是幫助偉大战友的一種手段）就像給“紐約每日論壇報”寫通訊一樣，是利用它們作為宣傳（往往必須採取隱蔽的形式）革命的唯物主義思想的合法機會。既然這是由馬克思和恩格斯決定的，他們也就竭力選擇那些對於無產階級的理論武器有重要研究價值的問題給百科全書撰写條目。

“美國新百科全書”上的條目是本卷前半卷的內容。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寫作這些條目時曾經不斷地同百科全書的編輯（查·德納等）的階級局限性發生衝突，因為後者以虛偽的資產階級客觀主義精神向作者提出要求——不表現黨派傾向。儘管任意刪改作者原文的編輯部提出了這種要求，儘管這一出版物的特殊的參考性質對革命的政論作品有一定的限制，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仍然善于在具有嚴整的百科全書的形式和體裁的文章中發揮革命無產階級的觀點。

給百科全書寫的條目大部分是恩格斯執筆的，雖然馬克思被認為是正式撰稿人。恩格斯承擔了這一工作的主要部分，使馬克思騰出時間去研究經濟問題，因為創立無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是

无产阶级领袖当时的主要理論任务。許多条目是由这两位馬克思主义創始人密切合作写成的。他們通过各种形式互相帮助，这种帮助往往具有直接合写的性质。

在恩格斯写的条目中，关于軍事問題的文章，如“军队”、“步兵”、“騎兵”、“炮兵”、“筑城”、“海軍”等占着中心地位。这些文章是恩格斯对战争的历史（远溯古代）、军队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深刻概括的結果，也是对他那个时代的武装力量的組織和状况、战争和战斗的方法和形式进行分析的結果；这些文章和恩格斯的其他軍事著作一样，为馬克思主义軍事科学和真正科学的軍事学术史奠定了基础。在这些文章中，恩格斯根据大量的实际材料，揭示了战争和武装力量的产生的历史条件，彻底研究了军队发展的最重要的阶段和特点，指出了军队的組織、战略和战术在不同历史时代的变化。恩格斯給“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的关于軍事問題的總結性文章完全反映出他作为无产阶级第一个軍事理論家和杰出的軍事学术历史学家，作为軍事科学和軍事历史科学方面的革命家和革新家的作用。在对許多知識部門进行有成效的研究并使自己的科学活动服从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利益的时候，恩格斯把“研究軍事問題”——如马克思在1859年2月25日給拉薩尔的信中所指出的——作为自己的專門學問之一。弗·伊·列寧把恩格斯称为偉大的軍事专家。

恩格斯的巨大功績是，他第一个用唯一科学的方法，即辯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研究軍事史和分析当时的军队。恩格斯与那些不能把武装力量的发展看做規律性的過程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历史学家不同，他指出，这种发展和其他社会現象一样，归根到底是由构成社会經濟基础的物质生产方式的变化决定

的。馬克思讀了恩格斯的“軍隊”一文后，于1857年9月25日寫信給恩格斯說：“軍隊的历史比任何东西都更加清楚地表明，我們对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間的联系的理解是正确的。”

恩格斯第一个在軍事历史科学中充分揭示了以下事实：武装力量的性质和类型以及它們的特点、装备和战术，部队的編制和訓練方法，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取决于社会制度和社会的阶级结构。恩格斯根据大量的历史实例，揭露了从古代东方奴隶占有制国家出現最初的有組織的武装力量以来軍队的阶级性。恩格斯在辩证地研究武装力量的发展时，把这种发展同社会經濟形态的历史具体地联系起来。他指出，軍队的盛衰取决于某一形态的形成和瓦解的过程。恩格斯強調指出，古希腊的軍队及其方陣战术，古羅馬的軍队及其較进步的軍团制度趋于衰落是奴隶占有制社会内部促使該社会崩溃的那些矛盾发展的結果。封建制度的瓦解，造成封建軍事体系解体，使得已經丧失了战斗力的騎士队消亡。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資本主义形成时代，武装力量经历了从雇佣軍队到根据普遍义务兵役制編成的群众性軍队的重大演变，这种演变反映了资产阶级社会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恩格斯认为某一种社会經濟形态由另一种进步的社会經濟形态代替的时期，革命地摧毁陈腐的社会制度和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时代，对軍事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恩格斯在著作中指出，这样的时代特別有力地推动了軍事方面的进步，而这些进步的变化的倡导者和代表者就是对社会衰朽势力进行斗争的革命阶级。恩格斯根据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例子，首先根据十八世紀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革命的法国对欧洲各封建专制国家同盟的战争的例子，来揭示这一規律性。他指出，正是在这些战争中突出地表現了

武装斗争的直接参加者人民群众的军事创造性，他們不断寻找并且终于找到了适合于新条件的新的战斗形式和新的战术布势的形式。后来，这一点在军队的組織和条令中固定下来，并且由于軍事領導人員和指揮人員等的活动形成了体系。恩格斯认为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的解放斗争，例如，瑞士人反对奥地利封建主和勃艮第封建主的战争、十六世紀尼德兰人反对西班牙統治的战争、十八世紀末英国的北美殖民地的独立战争、十九世紀初欧洲人民反对拿破侖压迫的战争、1848—1849年匈牙利的民族解放战争等，具有重大意义。恩格斯不仅在給百科全书写的长条目中，而且在一系列短条目中（“阿耳布埃拉”“布达”等）都談到了这些战争的历史。

恩格斯的軍事文章駁倒了許多資產階級軍事理論家所謂軍事学术原則的不变性和永恒性的观念。恩格斯在揭示战略和战术所固有的辩证的規律性时強調指出，适合于一定历史条件的战略和战术規則，如果运用到已經变化的情况下就要破产。例如，在“布倫海姆”的条目中，恩格斯在分析十八世紀初的一次大会战时注意到，在当时实行綫式战术的条件下成为法軍失敗原因的情况，在十九世紀，即在采取散开的队列和纵队相結合的时期則被认为“最有利的条件之一”（見本卷第 257 頁）。恩格斯把軍事学术的发展整个看成不断完善复杂的發展过程。他揭示了这一過程的各个不同方面的彼此密切的联系。恩格斯在文章中指出不同兵种的协同动作在軍事上的作用和它們的历史发展的相互制约性。

恩格斯写的条目包括了軍事的各个領域。其中对于军队的形成、組織和装备、补充和訓練、指揮管理等問題，战略和战术，地面部队各兵种和海軍的組織和战术，筑城工事的构造以及其他包括

部队的物质保障和供应(見“彈药”、“艾雷”等条目),部队的宿营(“露营”、“野營”等条目)等許多問題,都作为历史发展的規則而加以研究。恩格斯非常重視軍事技术。在上面已經提到的长条目中,恩格斯彻底地研究了軍事技术历史的各个最重要的方面,而某些細节在論述各种武器(“彈射器”、“刺刀”、“明火枪”、“馬枪”、“卡倫炮”、“爆炸彈”、“霰彈”等),各种进攻和防御的战斗手段(«Battery»、“炮艇”、“棱堡”、“掩障”、“防彈工事”等)和輔助的技术手段(“軍用桥”等)等一系列短条目中加以闡述。恩格斯根据大量实例揭示最重要的技术发明(火药的发明、火器的使用和改进、炮兵学和軍事工程学的进步、蒸汽机在海軍中的使用),对武装力量和軍事学术的发展具有革命化的影响。正如恩格斯在文章中所证明的,战术对軍事技术的从屬性,战斗的战术形式随着新式的大規模武器的出現而必然产生的变化,是反映着社会經濟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对軍事的作用的規律之一。

但是,恩格斯并不把武装斗争的規律仅仅归結为軍事技术对战斗方法的影响。他強調指出,某一军队的状况和它的战斗力,首先取决于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取决于军队产生和活动的社会条件。某一军队的战斗素质,同装备一样,取决于军队的組成,军队招募的社会成分,战斗訓練的程度,战士的觉悟水平和精神面貌,而后者在許多方面是由战争的性质决定的。恩格斯认为军队的士气有很大意义。因此,恩格斯在談到騎兵会战时強調指出,在两支强大的騎兵部队冲突的紧急关头,“精神因素,勇敢,在这里立即化为物质力量”(見本卷第319頁)。恩格斯还指出在战斗中起作用的其他因素:地形的影响,預备队的存在,指揮的灵活性,統帅的艺术。

恩格斯在著作中以很大的篇幅評价了卓越的統帥、軍事改革家、工程师和发明家的活动，在評价中对于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作了真正科学的解釋。恩格斯指出，杰出的統帥的活动决不取决于他們幻想的任意創造，而首先取决于不依他們的意志为轉移的物质前提。恩格斯強調指出，統帥的作用在于善于运用武装力量的客观历史发展所提出来的进行战争和战斗的方式和方法，并且最合理地利用新的技术装备和由于社会制度的改变而发生的军队的組成和战斗素质方面的变化。例如，恩格斯认为拿破侖的功績就是他把十八世紀末法国資产阶级革命所产生的新的作战方法变为“一套正規的制度”（見本卷第 39 頁）。同时恩格斯反对資产阶级編纂历史的典型方法，即迷信統帥并把他們偶像化；他指出甚至卓越統帥的活动都具有本人阶级根源所带来的局限性和矛盾性的特点。例如，他指出，弗里德里希二世虽然取得了軍事上的成就，但是他“不仅給普魯士人从此以后所特有的呆板和机械练兵方法奠定了基础，而且实际上造成了他們以后在耶拿和奧埃尔施太特蒙受空前耻辱的原因”（見本卷第 376 頁）。恩格斯強調指出拿破侖在战略和战术上的冒險主义成分，片面决定和失策，如龐大的纵队队形“曾使他在会战中不止一次地遭到失敗”（見本卷第 323 頁）。

本卷发表的恩格斯論述軍事的短条目使他的长条目的內容得到充实和具体化。其中某些条目如“阿尔馬”、“阿斯佩恩”、“比达索阿”、“博罗迪諾”等，分析了个別会战。一部分条目是恩格斯为了解釋一系列軍事术语和軍事技术用語而写的。在恩格斯的“战局”、“会战”和“攻击”等条目中，包含了有关作战的方式和方法、不同战斗队形和預备队的运用的重要的軍事理論結論。其中有許多

从战略和战术观点来看是很宝贵的原理。

恩格斯在军事文章中分析了不同时代首先是资本主义时代的战争历史的經驗。他批判地整理了并总结了从古代军事著作家到他那个时代的资产阶级军事理論家和军事历史家的军事理論思想上的成就。恩格斯探讨了許多民族的军队发展情况，竭力想把其中每一个民族对军事科学和军事学术的貢献反映出来。恩格斯所做的概括和結論以及他所采取的研究军事历史事件的方法，都具有不可估价的理論意义和政治意义。恩格斯在各条目中对武装力量进一步发展的某些方向所做的預測，例如他对于在枪械效果增大的影响下步兵战术上将有的变化（“步兵”条目）以及由于軍舰上枪炮装备能力不断增大而在海战战术和舰船类型上将有的变化（“海军”条目）的意見，作为科学預見的典范是非常有意思的。同时應該考慮到，恩格斯是生活在壟斷资本主义以前的时代，在他的著作中总结的是大規模使用机器技术装备和自动化武器时期以前的战争經驗。因此不能把恩格斯反映帝国主义以前的时代的军事特点的某些原理和論断机械地搬用到現代条件或者毫无保留地用于現代的战略和战术上。

还應該指出，由于当时許多国家的军事学术史都沒有整理出来，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恩格斯考慮到許多民族的军事經驗。例如，恩格斯在他写的条目中只是粗略地談到俄国的军事学术，主要是在他同马克思合写的俄国某些军事活动家傳記里提了提俄国军队的历史（“巴克萊-德-托利”、“卞尼格先”等条目）。在个别場合下，恩格斯由于利用西欧历史学家有偏見的著作而又沒有可能把这些著作同更客观的学术著作进行对照，对俄国军事历史的某些方面闡述得不够确切。例如，在“博罗迪諾”这一条目中就有不确

切的地方。这一条目对博罗迪諾会战的結果作了片面的估价，并且像“巴克萊-德-托利”这一条目一样，贬低了偉大的俄国統帥米·伊·庫图佐夫的作用。恩格斯虽然在他的著作的許多地方指出了中国发明火药以及中国人、印度人和阿拉伯人在火器使用方面的許多发明的偉大历史意义，但是由于当时軍事历史科学的状况，他不可能全面地反映东方各族人民对軍事学术的貢献。

恩格斯給“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的許多文章都是談已經成為歐洲資本主义国家侵略对象的东方各國的。这些文章都是反对經濟发达国家的資产阶级奴役并剥削亚非各國人民的掠夺制度，反对殖民侵略者和殖民冒險者的政策的。这些文章是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关心东方各族人民的命运，关心他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证明之一。

在“阿富汗”、“阿尔及利亚”、“緬甸”等条目中，恩格斯指出这些国家的自然資源引起了資本主义掠夺者的殖民欲望，他們利用这些国家的經濟落后和半宗法制度，把它們变成殖民掠夺的場所。恩格斯指出，第一次和第二次英緬战争（1824—1826, 1852）的結果，英國殖民者掠夺了緬甸，使它“失去了最富饒的領土”，占領了它的出海口（見本卷第287頁）。恩格斯揭露了在阿富汗的英國派駐官吏的阴谋詭計，揭露了英國殖民者对这个国家的內政的粗暴干涉以及他們为了发动旨在对阿富汗进行殖民侵略的1839—1842年英國阿富汗战争而采取的各种阴險毒辣和挑撥离間的方法。恩格斯把英國人侵占阿富汗看做是英國在中亞細亞进行殖民扩张的組成部分。恩格斯以法国侵占阿尔及利亚为例，特別清楚地揭露了殖民統治的野蛮方法和殖民奴役的后果。恩格斯在談到法国殖民者的行为时写道：“从法国人最初占領阿尔及利亚的时候

起到現在，這個不幸的國家一直是不斷屠殺、掠奪和使用暴力的場所。征服每一座大城市或小城市，每一寸土地都要付出巨大的犧牲。把獨立視為珍寶、把對外族統治的仇恨置於生命之上的阿拉伯和卡拜爾部落，在殘暴的襲擊下被鎮壓，他們的住宅和財產被焚毀和破壞，他們的庄稼被踐踏，而幸存的受難的人不是遭到屠殺，就是遭到各種奸淫和暴行的慘禍。”（見本卷第104頁）

恩格斯熱切同情受殖民壓迫或者受殖民奴役威脅的各族人民，他在條目中強調指出了這些民族對殖民者的反抗的解放性質和廣泛規模。他滿意地指出英國在阿富汗的冒險行為的可恥失敗，詳細地談到了1840年阿富汗人反對外國侵略者的總起義。這次起義的結果，正如恩格斯對阿富汗人民所作的評論那樣，“勇敢、剛毅和愛好自由的人民”給了殖民者一次严厉的教訓，消滅了他們的軍隊，並把他們趕出國境。恩格斯在指出阿爾及利亞當地居民不斷起來反對殖民統治時說，儘管法國進行了三十年的血腥戰爭（從1830年開始），儘管法國投入大批軍隊、花了大量金錢去征服阿爾及利亞，但是由於阿爾及利亞人的反抗，法國在這個國家的統治“是完全虛假的，如果不計算沿海地區、城市及其郊區的話”，而阿爾及利亞的各部落還在“繼續捍衛自己的獨立和仇視法國的制度”（見本卷第109頁）。

“阿爾及利亞”和“阿富汗”兩個條目充滿了作者對反對殖民者的解放運動的日益壯大和不可阻擋的信心。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這種運動在仇恨殖民壓迫、渴望自由的人民群眾中深深地扎下了根。這些條目雖然是為資產階級的出版物寫的，但是，是站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立場的。它們反映了無產階級的偉大領袖們對殖民主義所作的鬥爭，反映了他們要教育宗主國勞動人民同情殖民地

和附屬國的爭取解放的人民的崇高願望。

在“美國新百科全書”上，除了恩格斯寫的條目外，還發表了馬克思寫的許多條目。這主要是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上半葉的軍事活動家和政治活動家的傳記。其中許多條目，如“巴克萊-德-托利”、“卞尼格先”、“貝姆”、“博斯凱”、“布呂歇爾”、“貝雷斯福德”等，都是馬克思在恩格斯參加下寫成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合寫的條目還有“西班牙艦隊”和“艾阿庫裘”（後一個條目論述拉丁美洲各國反對西班牙統治的解放戰爭中的一次決戰）。

本卷發表的傳記性文章，是對各個不同的軍事和政治事件的參加者進行卓越的歷史評述的典範，是善于從個別人物的生平中不僅突出個人特點，而且突出那些反映時代、時代精神和這些活動家所代表的那個階級的本質的特徵的典範。這些傳記表明，馬克思和恩格斯——無產階級歷史科學的奠基人——是描繪歷史肖像的大匠。

在馬克思的“貝爾蒂埃”、“貝爾納多特”、“布律恩”、“貝西埃尔”、“布里昂”等條目中，描繪出拿破崙法國的軍事活動家和國家活動家的群像。正如馬克思指出的，其中許多人的生活道路反映了1789—1794年參加革命事件而後來成了反革命波拿巴政體的支柱的法國資產階級集團的演化。這些活動家大多數完全依靠“為軍事人才開辟了廣闊的道路”（見本卷第95頁）的革命，而在軍事上或外交上飛黃騰達起來。在確立了反革命大資產階級的統治的條件下，他們成了貪得無厭和追逐暴利之徒（布里昂、布律恩），成了渴求官職、封號和“空缺”王位的野心家（貝爾納多特），成了願為任何制度效忠的不擇手段的鉆營家（貝爾蒂埃）。馬克思所寫的一些拿破崙的元帥的傳記，提供了關於拿破崙第一帝國資產階級

上层的习气的清晰概念。

在“毕若”条目中，马克思鲜明地刻画了一个愚蠢而又残忍的反动分子——资产阶级七月王朝制度的忠实奴僕——的嘴脸；这个反动分子以血腥镇压法国工人、用背信弃义和残暴的方法征服阿尔及利亚和在摩洛哥从事殖民冒险著称。当时另一个典型的革命人物就是英国将军贝雷斯福德，他领导了一系列殖民掠夺性远征并参与镇压巴西和葡萄牙的革命运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布吕歇尔元帅传记是一幅广阔的历史画面。在传记中，这位卓越的德国统帅和爱国者的活动是以德国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为背景展现出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了布吕歇尔在1813—1815年反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中的重大作用，强调他“与民众同样地仇恨拿破仑”并且“由于他对庶民抱有同情心”而在群众中享有声望，他们认为“对于1813—1815年带有半正规半游击战争性质的战斗行动来说，布吕歇尔是最合适不过的将领了”（见本卷第191—192页）。

马克思的“勃鲁姆”以及他同恩格斯合写的“贝姆”等条目，都是写革命活动家的传略的。对于在反革命恐怖下牺牲的1848年革命的著名活动家罗伯特·勃鲁姆的描述表明，马克思在清楚地认识到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者的观点的局限性和温和性的同时，高度地评价了其中那些与庸俗民主派截然不同的忠实地于人民利益的人。在描写约瑟夫·贝姆的文章中，指出了这位波兰将军卓越的统帅艺术，后者在1849年匈牙利革命战争时期显出“在游击战和小规模的山地战中是第一流的统帅”（见本卷第134页）。在“玻利瓦尔-伊-龐特”一文中，马克思指出了在拉丁美洲各国反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斗争中（1810—1826）人民群众的作用，并且指

出了这次斗争的革命解放性质。但是，由于根据当时流行的有偏見的书刊的錯誤材料，馬克思对拉丁美洲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領袖西蒙·玻利瓦尔的活动和他本人作了片面的評价。在这些年
代，馬克思主义創始人的政論的反波拿巴方針、他們的力求揭穿对拿破侖第一及其仿效者的反动崇拜的意图，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馬克思对这位活动家采取否定态度；他根据自己的資料（当时他不可能相信这些資料是不客观的）把玻利瓦尔也算在拿破侖第一的仿效者之列。

本卷后半卷的內容是卡·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这一卓越的文献反映出馬克思和恩格斯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进行的斗争，是馬克思主义創始人为保护无产阶级革命家不受资产阶级思想家和代理人的恶毒攻訐而发表的言論。馬克思的这部用尖銳的諷刺形式写成的作品，是对那些采用誹謗和捏造事实等卑鄙手段攻击无产阶级运动的敌人进行致命反击的典范。

馬克思的这一著作是在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初期写成的，当时馬克思和恩格斯加强了他們的集合、团结和培养无产阶级战士干部的活动。他們依靠 1852 年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以后保留下來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核心，努力扩大和加强国际无产阶级的联系。馬克思寻求更广泛地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新的方法和机会，寻求适应情况改变后的党的活动的新的組織形式。馬克思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进行斗争，这个政党应是共产主义者同盟——这样一个政党的胚胎——的历史继承者和思想继承者。但是同时，馬克思却决不相信这个政党只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恢复。他认为必须建立一个更广泛，更有战斗力，更密切联系群众的組織，它能够担负起无产阶级群众革命运动的领导者这一具有全世

界历史意义的任务，并把这个运动引向胜利。马克思在这些年中谈到无产阶级政党的时候，指出他所指的不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他所理解的无产阶级政党是“按伟大历史意义上来说的政党”（见马克思于1860年2月29日写给斐·弗莱里格拉特的信）。

在建党斗争的这一个阶段，马克思认为特别重要的是不使正在形成、还未巩固的党的队伍受到诽谤性攻击，这种攻击会在工人运动中起瓦解作用并破坏工人对自己的领袖的信任。为了巩固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和威信，马克思努力使工人和劳动群众对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过去和现在的活动、他们的道德品质、他们的观点和目标得到真正的而不是被诽谤所歪曲了的了解。使群众彻底认识到无产阶级政党的事业的伟大和纯洁，不让无产阶级的敌人诬蔑和诋毁——这就是马克思要写出“福格特先生”这一著作的崇高动机。

马克思写这一著作，是为了回答1859年12月出版的卡尔·福格特的诽谤性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福格特在这本小册子里不惜歪曲事实、睁眼撒谎，拼命对马克思及其战友散布大量恶毒骯髒的谎言，对他们共产党同盟中的活动大肆歪曲，诬蔑他们怀着自私自利的、几乎是犯罪的动机。福格特的造谣中伤，是同普鲁士警探于1852年进行科伦挑衅性审判时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家捏造的罪名，同敌视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袖们屡次对马克思及其战友进行的诬蔑遥相呼应的。德国的资产阶级报刊响应了福格特的诽谤。工人运动的凶恶敌人广泛地利用了——而且后来继续利用福格特的小册子。

马克思认为由福格特再次掀起的这场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进攻，表明资产阶级力图给正在形成中的无产阶级政党以致命的打

击，并从道义上使它在社会人士的心目中破产。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这一著作中写道：“統治阶级的告密者們也随时随地在同样无耻地对捍卫被压迫阶级利益的先进政治战士和作家造謠中伤。”（见本卷第453頁）福格特的言論之所以具有极大危險性，还在于这本誹謗性小册子的作者挂着民主派招牌，在民主派中間有影响，在资产阶级公众中間享有自然科学家和政治活动家的声誉。在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当时面临爭取全国革命民主統一的尖銳斗争，必须加强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群众中的影响，因而揭露福格特和他的应声虫的面目就特別重要。马克思于1860年2月23日給弗萊里格拉特写信說，同福格特的斗争“对于党在历史上的声誉和它在德国的未來的地位具有決定性意义”。可見，在駁斥福格特的这场論战中，马克思不仅維护了无产阶级革命家过去的革命活动，而且也維护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未來。

马克思在这一著作中揭穿了福格特的所有說法都是謊言，揭露了他这个处心积慮的捏造者和誹謗者的嘴臉。針對福格特的歪曲捏造，马克思叙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以及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产生和活动的真实情况。在該著作的第四章（“泰霍夫的信”）里，马克思对第一个国际共产主义組織的历史作了簡短的但內容非常充实的介紹。在这一章以及其他几章（第三章“警察作風”、第六章“福格特和‘新萊茵报’”）里，马克思描述了共产主义者同盟进行活动的历史条件，指出了同盟的性质和目的，說明了无产阶级这一派在同盟中同宗派主义分子的斗争。談到維利希—沙佩尔集团的非組織活动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引起分裂的原因时，马克思強調指出这个宗派集团采取的冒險密謀策略的危害性，并证明这种策略同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任务是不相容的。马克思举